

# 逃离抑或竞争： 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

耿鹏鹏 罗必良\*

**摘要：**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分配方式及其稳定性状态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计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然而，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既抑制农民生产稳定性预期的形成，也催生出农民的地权博弈策略。本文研究发现，长期地权不稳定的地区，农民更为认同“读书改变命运”，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以“逃离”不稳定的生存环境，或通过教育信号显示以强化家庭地权竞争力量。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的村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受教育年限更长，且更不认同“读书无用论”；地权不稳定作为历史遗产会形塑“读书重教”的集体意识。本文强调，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关键词：**地权稳定性；信号显示；地权博弈；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F321.1；F129

## 一、引言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习总书记强调，要推进教育公平，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村的教育事业<sup>①</sup>。我国农村地区广布，农民人口众多，农村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和重要阵地。

在古老乡土中国，以农为业、以农为生的农民通过读书、受教育以获得学识和功名，一直是普遍的社会价值偏好(Kulp, 1925)。士大夫官僚阶层的特殊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对乡村教育极具利益诱导作用(萧公权, 2014)，而“日日应举亦不累”<sup>②</sup>也成为乡土士子的人生状态。由此，乡村教育不仅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而且成为农民脱离繁累农事活动进入

\*耿鹏鹏，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30036，电子信箱：gengpp0304@163.com；罗必良（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510642，电子信箱：luobl@scau.edu.cn。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协调研究”（项目编号：71933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生态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72141009）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sup>①</sup>参见钟焦平，2019：《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中国教育报》3月11日第2版。

<sup>②</sup>出自清朝乾隆皇帝《训诫士子谕》，原句为“为文以应者，得失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耶？”

特权阶层以改变命运的“正向隧道”(Chang, 1955)。进入现代社会,教育依然是乡村学子走出农村,获取职业,突破固有生存状态的关键,且成为维系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刘云杉, 2015)。特别是在人地矛盾极为尖锐的中国乡村,农民的生计依赖于“一亩三分地”的小农经营格局,且面临着地权风险的隐患,进一步突出了教育对于农民而言所具有的特殊工具性意蕴,也由此使得乡村教育与农民土地稳定性、安全性息息相关。

事实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长期面临着边界模糊、地权稳定性不足的历史痼疾(刘守英, 2019)。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户成员权的天赋性和公平性决定了地权均分的必然性,农地调整一度成为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罗必良, 2019)。从产权实施的角度看,一方面,因人口增减变化使得地权发生频繁变更,造成了农民对土地的预期不稳定(周其仁, 2017);另一方面,农地调整作为村庄自发的产权界定方式,地权重新分配与界定的平衡达成往往受到地权竞争参与主体之间家庭力量对比的影响。由此,地权变更将诱发村庄内部的地权纠纷、争夺和博弈,农民产权的弱化使得村庄成员必须通过自发的行动秩序参与地权竞争以提高对所获地权的有效保护,此种行动秩序往往表达为村庄成员间原生性的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的博弈均衡(耿鹏鹏、罗必良, 2021a)。

农地历来是农民的“命根子”(Udry, 1996)。中国农村地权稳定性的缺位无疑关乎农民家庭的生计、存续与发展,从而凸显了“读书改变命运”这一特殊的价值信念。对农民而言,读书受教育具有应对地权稳定性不足的重要功能。一方面,通过读书受教育“逃离”预期不稳定与低效率的农事活动(龙登高, 1998);另一方面,教育具有重要的信号显示作用,是强化农民家庭地权竞争力量的重要砝码,并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成员往往具有更强的维权观念和更充分的议价能力与谈判力量。因此,读书受教育具有重要的行为发生学意义,不仅是逃离农地经营的工具,也是地权竞争的策略。中国文学中“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sup>①</sup>等,无不表达着“读书改变命运”与“光耀门楣”的生存与竞争逻辑(罗必良、耿鹏鹏, 2022)。

本文试图从地权稳定性角度考察农民的生存策略选择,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以期揭示中国乡村教育投资的制度内涵与产权逻辑。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尽管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从农村的地权稳定性及农民生存预期视角,以教育的工具性意蕴为切入点,关注农村地权稳定性不足情境下农民教育投资的基本性质;第二,中国农村历来具有“读书改变命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观念,但少有文献对其给予有证据的经济学解释,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出发,解释这一观念生成和存续的根源。

## 二、分析线索

### (一) 中国农村的地权模糊与农民行为响应

新中国成立后,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耕者有其田”、到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平均收益分配、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均包”,都充分体现出村庄土地成员权的“均权”特征。问题的关键是,地权均分虽能够维系土地保障的“生存伦理”原则,但却隐含着地权不稳定的固有风险。首先,旨在维护公平的地权界定与实施可能隐含着地权不稳定和农民产权弱化

<sup>①</sup>出自宋代汪洙的《神童诗》,全句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的内生机制(周其仁,2002);其次,地权均分意味着一旦村庄人地关系发生改变,地权调整将成为平衡要素分配的必然发生机制(姚洋,2000)。由此,地权不稳定成为了中国农村发展长期面临的制度性问题。在人均土地极少的中国小农经济中,农民的理性原则是以生存安全为第一位。地权不稳定带来的农业经营中断风险和预期生产的不稳定必然诱发农民改变生存状态的行为响应。

### 1.地权稳定性不足、预期模糊与离农倾向

地权稳定性不足不仅导致农业生产低效化,更严重的是会动摇农户农业经营的稳定预期、侵蚀农民开展持续性农事活动的积极性。具体而言,地权稳定性不足意味着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着中断风险,由此带来前期投资无法收回,这无疑将挫伤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以生存安全为第一要义的中国小农户,往往寻求着维护生活稳定和就业保障的占优策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农民愈加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甚至能够彻底退出农业以谋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蔡昉等,2018)。与此同时,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地权稳定的重要性,但农地调整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农村普遍发生的现象。逻辑上而言,农业经营风险将加剧农民的离农倾向,特别是在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农民离农机会成本有效降低的背景下,地权频繁变更导致的农业经营稳定性不足与农业生产低效化将激励农民“逃离”农村(仇童伟、罗必良,2017)。

### 2.地权稳定性不足、产权弱化与地权竞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地权弱化与不稳定性问题长期存续(周其仁,2002;李尚蒲、罗必良,2015)。地权弱化降低了农民地权的排他性,引发村社不同利益主体的相机性抉择,使得村庄的地权分配和实施中充满着非正式力量的博弈关系(于建嵘,2001)。产权模糊和弱化所形成的“公共领域”将激化村社成员对地权租值的争夺。这意味着,农民的行为能力在地权界定与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扩展。第一,村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所形成的团体力量决定了在利益争夺中的比较优势,家族势力、亲缘关系和社会资本成为获得地权的重要力量(陈柏峰,2020)。第二,具有高学历成员的农户家庭的文化水平更高并具备较强的维权意识和谈判能力(丰雷等,2013)。而且,读书、受教育具有重要的信号显示功能,具有高学历成员的农户往往极具荣耀和力量,这种“炫耀性”信号显示能够强化农户在村社利益互动中“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使得农户家庭在地权竞争中营造有利的享益格局。

## (二)地权稳定性不足与教育的“正向隧道”效应

地权稳定性不足将强化农民“逃离”农业和争夺地权租值两方面的行为激励。而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工具性功能既可以诠释农民寻求稳定生活环境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表达农民地权竞争的博弈策略。

### 1.地权稳定性不足、离农倾向与“读书是唯一出路”

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兼并的历史痼疾直接导致农民的地权稳定性极不充分,并动摇其生存预期,使得摆脱农事活动、进入特权阶层成为乡村士子的普遍理想(罗必良、耿鹏鹏,2022)。其中,受教育并参加科举考试为具有身份固化特征的农村学子提供了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龙登高,1998)。

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农村,教育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生存激励功能。第一,旨在维护公平的地权调整动摇了地权稳定性,农民无法形成长期经营的稳定预期,从而具有强烈的离农倾向。但囿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潜在“失地”风险的桎梏,读书受教育成为乡村学子走出农

村的重要方式。第二,户籍制度的松动虽然释放了农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但农民非农就业往往面临着教育门槛、技能门槛的约束,这意味着通过非农就业脱离农事活动并不必然强化生存和就业的稳定性,离农务工将加剧“失地”可能性进而提高社会保障风险(姚洋,2004)。这进一步突出了教育与农民地权稳定性的紧密关系。

事实上,强化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可以避免不稳定的农事经营在农民家庭中的代际传承,通过对子女的良性教育提高其学历水平和知识技能水平,强化其走出农村获得城市稳定工作与固定户籍的能力(赵耀辉,1997);另一方面,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降低迁移难度和机会成本。具备一定教育程度的农民不仅可以满足外出就业的知识与技能门槛,而且在获取就业信息、得到就业机会方面更具优势(Schwartz,1973)。因此,教育成为农民应对地权风险的占优策略。

## 2.地权稳定性不足、竞争激励与教育的信号显示效应

地权稳定性不足将扩张农地产权的“公共领域”,作为产权主体的农民不可避免面临着产权弱化、产权被部分“删除”、“限制”和“约束”的问题(耿鹏鹏、罗必良,2021b)。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加剧产权主体预期不足导致的租值耗散,另一方面将加剧产权“公共领域”的租值争夺。由于产权“公共领域”的主体并不明晰,从而决定了非正式力量在产权分配和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普遍发生的农地调整成为地权不稳定的主要诱因。地权频繁变更加剧了村社土地分配中的纠纷和博弈,即通过家庭力量谈判、家族社会资本庇护乃至潜在暴力威胁,或在调整期进行地权界定的争夺,或在界定之后进行地权维护。实际上,在法律缺失时,社会自发的私序往往能够有效提高对产权的保护,降低产权被侵犯的风险(Ostrom,1990;迪克西特,2007)。其中,地权调整下的产权保护私序与农民个人能力、家族势力与声望等社会资本密切相关,附着在土地上的社会资本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相关主体在产权纠纷中的收益(陈柏峰,2020)。

重要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学识都被视为是主要的社会价值和乡村追求(Kulp,1925;萧公权,2014),具有较高学识和文化底蕴的家庭在农村社会中往往具有较高声望与地位,并获得整个村社的尊重(赵耀辉,1997)。受教育具有信号显示功能且成为家庭重要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够得到村庄的关系资源,而且可以强化家族在利益博弈、地权保护中的优势(仇童伟、罗必良,2017)。尤其是现代农村社会,高学历的农户家庭成员多从事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和谈判能力,进而在村庄地权分配和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在中国乡土社会,行为能力是产权界定和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教育程度往往是行为能力的重要表达。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一般具有更重要的社会影响。实际上,教育不仅成为农户家庭维护其农地经营权稳定性的重要资本,同时会强化农民在农地产权保护中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读书、受教育与农民地权稳定性间的正反馈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在提高农户对农地产权保护的同时会降低农地调整中经营权不稳定的作用效果。

##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CLDS每两年一次对中国城乡开展动态追踪调

查,样本覆盖了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sup>①</sup>,对村庄社区结构、家庭状况和劳动力特征进行系统监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和稳定性。鉴于本文所关注的是地权稳定性与农村教育的研究主题,故截取农村样本数据,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获取全国7106个农户样本。在实证分析中,由于存在部分变量数据缺失,因此最终各个模型的观测样本会有所不同。

## (二) 描述性证据

基于CLDS(2016)数据,表1描述了不同地权稳定情形下村庄农户的平均教育支出和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异。可以发现:(1)相比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的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水平均更高;(2)相比地权相对稳定的村庄,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更长。从而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可能强化村庄成员的教育观念。

**表1 不同地权稳定性村庄的经济社会特征**

地权稳定性	占样本比重(%)	教育支出(元)	教育支出占比(%)	受教育年限(年)
发生农地调整	16.27	4 680.79	30.93	8.75
未发生农地调整	83.73	4 541.65	21.80	7.98

注:数据来源于CLDS(2016)。

表2描述了不同程度农地调整的村庄内农户的教育程度差异。根据农地调整方式的不同将农地调整划分为利用村里的机动土地进行调整、村组内部分农户土地小调整和村组内土地打乱重分。调整程度逐次加强,地权稳定性依次变差。可以发现,调整程度越大的村庄内农户的教育支出水平越高,村庄农民受教育年限也越长。从而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的地区可能具有更高的教育重视程度。

**表2 不同农地调整程度村庄的经济社会特征**

农地调整程度	占样本比重(%)	教育支出(元)	教育支出占比(%)	受教育年限(年)
利用机动地调整	20.86	4 135.90	21.61	8.73
土地小调整	66.05	5 949.06	31.81	8.84
打乱重分	13.08	7 613.66	39.31	10.20

注:数据来源于CLDS(2016)。

## (三) 变量设置及说明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的地权稳定性对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本文选取农户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测度农户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 2. 主要解释变量

主要解释变量为村庄层面的地权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一度普遍存在的农地调整是地权不稳定的核心触发因素,也是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下地权模糊最突出的发生机制,因此土地调整可用来表示农户地权的稳定程度。本文选择村庄问卷中“2003年至今村里的土地是否发生过调整”的问项结果作为解释变量。

<sup>①</sup>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西藏和海南。

### 3.控制变量

教育支出属于家庭支出范畴,中国家庭传统的家长制特征决定了户主在家庭内部决策时发挥主导作用。本文首先控制户主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和政治背景特征,进一步控制家庭规模、家中上学人数和宗族等变量。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呈现明显的财富效应,本文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村庄收入水平、非农经济、外出务工水平等变量。耕地具有就业保障和生存保障功能,可能对教育投资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区域虚拟变量。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3。

**表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教育支出	家庭教育支出(元,取对数)	4.382	4.327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0.295	3.448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调整	2003年至今,村里的土地是否发生过调整(是=1;否=0)	0.163	0.369
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			
户主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53.348	12.083
户主受教育水平	户主的学历水平(从低到高赋值①)	2.668	3.593
户主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1;不健康=2;一般=3;健康=4;非常健康=5	3.449	1.097
户主政治背景	户主的政治面貌(党员=1;非党员=0)	0.088	0.284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人)	4.830	2.142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取对数)	8.407	1.875
上学人数	家庭中上学的人数(人)	0.768	0.960
人均耕地面积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取对数)	1.738	10.766
村庄特征			
村庄人均年收入	村庄人均收入(元,取对数)	8.926	1.108
村庄非农经济	村庄是否有非农经济(是=1;否=0)	0.269	0.444
村庄外出劳动力	村庄外出务工人员占村总人口比重	0.285	0.303
宗族	村庄是否有宗祠、祠堂(是=1;否=0)	0.761	0.426
区域虚拟变量	市层面虚拟变量	-	-

#### (四)模型选择

为了估计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的影响,本研究建立以下基准模型:

$$Y_i = \alpha_0 + \alpha_1 X_i + \alpha_2 D_i + \varepsilon_i$$

上式识别了两组方程,其中 $Y_i$ 为农户家庭教育支出额的对数和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 $X_i$ 表示地权稳定性,使用农地调整加以表征; $D_i$ 表示由控制变量组成的矩阵,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变量。 $\alpha_0$ 为常数项, $\alpha_1$ 和 $\alpha_2$ 为待估计系数, $\varepsilon_i$ 表示随机误差项,并假设满足标准正态分布。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影响的无偏估计需

①“学历水平”的具体赋值为:未上过学=1;小学/私塾=2;初中=3;普通高中=4;职业高中=5;技校=6;中专=7;大专=8;本科=9;硕士=10;博士=11。

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法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 (一) 农地调整与农户家庭教育支出

表4汇报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发生过农地调整村庄的农户,其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均显著高于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分别高出36.1%和12.9%,从而表明,农地产权的不稳定将强化村庄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农地调整	0.361** (0.147)	0.129*** (0.047)
户主年龄	-0.070*** (0.003)	-0.013*** (0.005)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16** (0.007)	-0.001 (0.002)
户主健康状况	0.025 (0.032)	0.078* (0.041)
户主政治背景	0.051 (0.109)	0.067 (0.044)
家庭规模	0.025 (0.019)	-0.043*** (0.012)
家庭人均收入	0.256*** (0.016)	-0.717*** (0.253)
上学人数	2.224*** (0.044)	0.117*** (0.021)
人均耕地面积	0.000 (0.001)	0.001* (0.001)
村庄人均年收入	0.085* (0.047)	-0.046 (0.043)
村庄非农经济	0.264** (0.119)	0.251** (0.108)
村庄外出劳动力	0.001 (0.004)	0.001 (0.001)
宗族	0.422*** (0.145)	-0.359* (0.207)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364*** (0.764)	8.695*** (3.209)
观测值	7 544	7 106
R <sup>2</sup>	0.373	0.064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二) 稳健性检验 1: 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

本节从村庄农地调整的频次和程度维度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农地调整的次数(2003年以来实际发生调整的次数)越多、农地调整程度(具体赋值:利用机动地调整=1;土地小调整=2;打乱重分=3)越高的村庄,农户教育支出水平和教育支出占比均更高,从而表明农户家庭的教育重视程度随地权不稳定的加剧有逐渐强化的趋势。由此可见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稳健。

表 5 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农地调整频次	0.175** (0.074)		0.084*** (0.028)
农地调整程度		1.429** (0.716)		0.435** (0.1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399*** (0.766)	-3.571 (2.753)	8.733*** (3.215)	-0.349 (0.662)
观测值	7 544	1 006	7 106	949
R <sup>2</sup>	0.373	0.362	0.064	0.142

注:\*、\*\*、\*\*\*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同表 4,限于篇幅,此处未给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下同。

### (三) 稳健性检验 2:基于土地集中度历史数据的考察

历史上人地矛盾较大的地区往往面临着较大的地权风险,按照本文逻辑,该地区农民的教育重视程度更强。本节用 1919 年中国各省份农村“土地集中度”的数据<sup>①</sup>刻画人地矛盾以表征地权稳定性来替换解释变量。其合理性在于,土地集中度越高的地区所面临的人地矛盾可能越大,土地兼并情况越严重,并动摇地权稳定性。表 6 显示,无论是按照 50 亩农户占比衡量土地集中度(集中度 1)还是按照 100 亩农户占比(集中度 2),均表现出对当前农民教育支出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且集中度 2 的作用大于集中度 1 的影响。从历史遗产的视角逻辑一致地验证了本文结论。

表 6 人地矛盾与农户家庭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集中度 1	0.196*** (0.054)	0.147** (0.066)	
集中度 2			0.381*** (0.105)	0.287** (0.1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311** (1.361)	2.952*** (1.052)	-1.617 (0.988)	4.226*** (1.589)
观测值	6 085	5 707	6 085	5 707
R <sup>2</sup>	0.363	0.080	0.363	0.080

### (四) 稳健性检验 3:个体层面的证据

本文基准回归是对农户层面的考察。逻辑上说,地权稳定性所导致的教育观念差异,应在农民个体层面具有同样的表达。为此,本节选取 CLDS 个体问卷中“受教育年限”、“对‘读

<sup>①</sup>数据来源于长野郎(2004)的《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中 1919 年中国各省份农村土地分配情况,分别统计拥有超过 50 亩和 100 亩土地的农户占比,以刻画各省份的土地集中度。参见长野郎,2004:《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大学越来越没用’观点的看法”作为本节的被解释变量。表7的结果显示,地权稳定性越差的村庄农民具有更长的受教育年限,对“读书无用论”的观点更加不赞同,从而在农民个体层面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7 个体层面的证据

	受教育年限			不赞同“读书无用论”		
农地调整	0.653*** (0.227)			2.558*** (0.443)		
农地调整频次		0.175* (0.101)			1.279*** (0.221)	
农地调整程度			0.223 (0.566)			0.486** (0.218)
受访者性别	1.061*** (0.133)	1.061*** (0.133)	1.278*** (0.414)	-0.053** (0.022)	-0.053** (0.022)	-0.100 (0.062)
受访者年龄	-0.093*** (0.005)	-0.093*** (0.005)	-0.105*** (0.019)	0.001 (0.001)	0.001 (0.001)	0.003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420*** (1.019)	5.348*** (1.021)	3.736 (3.880)	6.856*** (0.548)	6.856*** (0.548)	1.769* (1.069)
观测值	3 447	3 447	418	9 499	9 499	1 245
R <sup>2</sup>	0.156	0.155	0.229	0.109	0.109	0.104

(五) 稳健性检验 4: 组合面板数据的考察

鉴于2016年CLDS数据中刻画农民教育观念的变量更具丰富性,本文基准回归中所使用的数据为2016年的截面数据。考虑到地权稳定性与教育投资均为长期行为,为进一步强化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识别,本节组合CLDS数据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面板数据。由于本文采用的教育支出实际数值在年际之间存在价格差异,因此本节仅考察地权稳定性对教育支出占比的影响。

表8是使用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其中分别汇报的是未引入控制变量和年份、地区固定效应的模型,引入控制变量但未引入年份、地区固定效应的模型以及控制最为严格的模型。其估计结果均一致地显示,农地调整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地权稳定性与农民教育投资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

表8 组合CLDS三期面板数据的再考察

	教育支出占比		
农地调整	0.024*** (0.005)	0.131*** (0.014)	0.193*** (0.05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02*** (0.001)	0.220*** (0.054)	0.274** (0.117)
观测值	1 838	1 520	1 520

(六) 稳健性检验 5: 对村庄新生人口的讨论

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户成员权的天赋性和公平性决定了赋权均

分的必然性,由此农地调整曾一度成为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地权调整绝大多数是在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后对要素分配不平等的响应。这意味着,随着村庄新生人口的增加,发生农地调整的需求更强烈,由此产生地权不稳定的潜在隐患。本节基于村庄新生人口做进一步分析。表9中第(2)列和第(4)列在控制村庄新生人口变量之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具有正向显著性且估计系数变大。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农地调整是一种地权的“均分”机制,村庄新生人口越多,人地矛盾越大,农地调整发生的可能性越高,可能加剧该地区的地权不稳定性,从而强化地权调整对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的正向影响。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表9 基于村庄新生人口的讨论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1)	(2)	(3)	(4)
农地调整	0.361** (0.147)	0.371** (0.147)	0.129*** (0.047)	0.174*** (0.058)
新生人口占比		-6.664 (4.752)		-21.597* (11.5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364*** (0.764)	3.191*** (0.768)	8.695*** (3.209)	8.673*** (3.189)
观测值	7 544	7 401	7 106	6 970
$R^2$	0.373	0.374	0.064	0.066

## 五、内生性问题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引入农地调整变量可能会引起内生性问题。首先,对教育更重视的农户,在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村庄中农户成员的离农程度比较高,人口流动性更强,使得村庄内部户籍人口不断变更,由此发生的是村庄内基于地权重新分配的农地调整。其次,模型中可能存在其他观测不到的遗漏变量。本文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 (一)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再检验

本文设计两类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首先,采用县内其他村庄的农地调整率作为工具变量。理论上讲,同县其他村的农地调整的示范作用会影响本村农地调整。但是,村庄是中国农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村庄组织文化在村庄成员的行为决策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长期的聚居生活形成了村庄的基本秩序。实际上,本村以外的村庄对于农民而言是不同的生活单位,并具有明显的行为差异与生活界限。这意味着,本村农户的行为观念并不会直接受到其他村庄的影响,本村外其他村庄的农地调整发生也并不会直接影响本村农户的行为预期。其次,本文进一步参照 Giles 和 Mu(2018)的思想,选择村庄近年来是否进行换届选举(是=1;否=0)作为农地调整的工具变量。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村庄选举会影响土地的调整与分配(Brandt et al., 2004; Deininger and Jin, 2009),但选举具有固定周期和流程,相对而言是外生的,并不会对农民的教育投资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以上工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表10中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表明,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第(1)列和第(2)列使用县内其他村庄的农地调整率作为工具变量,

估计结果表明,相比地权较为稳定的村庄,地权并不稳定的村庄内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支出水平。第(3)列和第(4)列使用村庄选举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同样与基准回归相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杜宾-吴-豪斯曼检验(DWH test)的结果显示农地调整估计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并不严重。

表 10 工具变量法再估计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1)	(2)	(3)	(4)
农地调整	0.295* (0.177)	0.228*** (0.070)	1.034** (0.489)	0.167** (0.0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872*** (0.799)	7.536*** (2.586)	3.102*** (0.854)	7.437** (2.955)
观测值	7 544	7 106	7 544	7 106
R <sup>2</sup>	0.378	0.080	0.362	0.013
Under-identification test	4457.434***	4171.203***	2041.849***	1973.954***
Weak identification test	6708.104	6205.042	2500.008	2423.489
DWH test	0.644	1.461	0.235	1.127

(二) 基于 DID 模型的再检验

本节拟合 2014 年、2016 年 CLDS 数据两期样本,设置准自然实验,使用 DID 模型对地权稳定性与农民教育投资的因果关系做进一步验证。设定 2014 年为干预发生前的初始期,分别剔除 2014 年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样本,仅保留 2014 年未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样本,从而严格界定 2016 年为干预发生期。

表 11 是 DID 模型的估计结果。未引入地区固定效应和引入地区固定效应的模型均一致地证明,地权的不稳定将使得农户家庭对于教育更为重视。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一致。

表 11 基于 DID 模型的再估计

	教育支出占比	
	(1)	(2)
农地调整	-0.064* (0.037)	-0.049 (0.049)
年份	0.093** (0.037)	0.426*** (0.092)
农地调整×年份	0.101* (0.056)	0.151** (0.0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区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586*** (0.974)	3.361*** (0.994)
观测值	7 854	7 854
R <sup>2</sup>	0.055	0.069

六、机制检验:对教育工具性的考察

(一) 地权不稳定、离农倾向与教育支出

前文的理论分析说明了本文的基本逻辑,地权长期不稳定的地区,农民无法形成稳定的生产、经营和生存预期,从而产生强烈的离农倾向。也正因此,“受教育”成为重要的离农工

具,从而有助于农民通过教育的正向隧道效应“逃离”农业和农村。为此,本节使用 CLDS 问卷中“接下来的工作打算”的问项结果<sup>①</sup>,拟合出农户家庭中打算离开农业生产的家庭人数占比以刻画家庭的离农倾向。表 12 中,第(1)列估计结果显示,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内农户都具有更高层次的离农倾向。第(2)列和第(3)列估计结果显示,村庄内农户更高层次的离农倾向将提高家庭的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从而表明,离农倾向是不稳定地权环境下农户教育支出增长的重要决定机制。

表 12 机制检验:对离农倾向的考察

	离农倾向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1)	(2)	(3)
农地调整	0.017*** (0.005)		
离农倾向		0.688** (0.307)	0.015 (0.1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13 (0.012)	15.275*** (4.139)	15.361*** (4.700)
观测值	7 683	6 623	6 214
R <sup>2</sup>	0.127	0.386	0.080

## (二) 地权不稳定、工具性需求与教育支出

地权模糊和不稳定实际上为村庄中具有较强行为能力的农民创造了租值攫取和利益寻租的极大空间。这意味着,一个具有较强力量、声望的农户家庭往往成为地权博弈和竞争中的主导者和获益者。从教育的意义上来说,读书受教育不仅可以成为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寻求非农就业和稳定生活的“敲门砖”与“通行证”,而且可以强化农村家庭的力量和声望。教育是强化农民家庭地权竞争力量的重要砝码,并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往往具有更强的维权观念和更充分的议价能力与谈判力量,在地权竞争中抑或稳定地权中均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曾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在农村与城市间划清明晰的界限,不仅强化了教育的“正向隧道”功能,而且长期的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商品粮”偏好、城市偏好,造成了家中有城市工作成员的家庭往往成为村庄内部被人羡慕、推崇和敬重的对象。显然,农村居民对教育的看法,除了形成一套基于生计规划、走出农村寻求稳定生活环境的实用性态度之外,还有对于读书、求知、走向城市的天然敬畏,这种敬畏往往会强化家庭的社会力量(安超、康永久,2021),从而在地权模糊的环境中形成竞争地权利益租值的比较优势。

本节使用 CLDS 问卷中“对‘读大学越来越没用’观点的看法”的问项结果拟合出家庭层面的对“读书无用论”的态度,以表征读书的工具性作用。表 13 中,第(1)列估计结果显示,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内农户更加肯定读书的有用性。第(2)列和第(3)列估计结果显示,村庄中越肯定教育有用性的家庭具有更高水平的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从而表明在地权不稳定的制度情境下,教育的功用性或读书的工具性作用是农户教育支出增长的重要中

<sup>①</sup>CLDS 问卷中“接下来的工作打算”的问项结果包括在村里务农、在村里从事其他的非农工作、到镇上或县城等地外出务工。将后两项界定为非农务工。

间机制。

表 13 机制检验:对教育功用性的考察

	教育功用性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1)	(2)	(3)
农地调整	0.019*** (0.006)		
教育功用性		0.598*** (0.125)	0.336*** (0.1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29*** (0.028)	14.860*** (4.134)	15.128*** (4.634)
观测值	7 683	7 544	7 106
R <sup>2</sup>	0.101	0.387	0.081

## 七、进一步的分析

### (一) 进一步分析 1: 农地确权的情境分析

2009 年试点并于 2013 年推广的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被视为维护地权稳定与安全最为重要的政策举措。本节进一步分析农地确权颁证的情境。逻辑上讲,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倘若获得了确权证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权的稳定与安全,也就弱化了农户基于“逃离”农业农村的教育工具性激励。因此,本文基于农户是否确权颁证将全样本分为确权组和非确权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 14 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未确权农户,地权调整会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教育支出,且系数值远大于基准回归结果,由此证明在地权极不稳定地区,农民有着更为强烈的教育观念。但对确权农户而言,农地调整并未表现出对教育支出的显著影响。从而验证以上推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地确权对收入因素的干扰,可能导致在确权组中农地调整表现出对教育支出占比的显著影响,但估计系数要远小于未确权组。

表 14 农地确权分组检验

	农地确权		农地未确权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农地调整	0.294 (0.229)	0.310*** (0.119)	2.862** (1.428)	0.825*** (0.1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04 (0.715)	14.364** (5.822)	9.101*** (2.067)	3.888*** (0.536)
观测值	4 199	3 977	4 090	3 799
R <sup>2</sup>	0.382	0.102	0.411	0.168

### (二) 进一步分析 2: 基于宗族地权庇护的考察

中国农村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决定了宗族对地权具有天然偏好,这会导致村庄内部地权界定过程中的竞争。基于本文逻辑,地权不稳定时期的村庄地权分配很大程度依赖于非

正式力量的强弱对比关系。自身实力雄厚、具有强大宗族力量加以保护的家族在农地调整中往往会成为获益的一方。并且,宗族内部的血缘亲情关系决定了宗族内部的地权纠纷往往可以遵循一套族规或人情关系加以解决和处理并弱化宗族内部的权利纠纷。因此可以推断,在一个宗族人口覆盖面更多的村庄内,由于多数的农民获得了宗族庇护,在农地调整中的谈判力量和讨价还价能力更强,将弱化地权调整带来的预期不足所诱发的教育激励。而在一个多姓氏共存的村庄中,地权调整中的纠纷和竞争将加剧,并进一步动摇地权稳定性和农业经营性预期,也将强化教育激励效应。基于此,本文使用村庄问卷中“村庄姓氏数量”“村庄第一大姓人口占比”和“村庄前三大姓人口占比”的问项结果进行实证检验。表 15 的估计结果显示,村庄内姓氏越多将强化农地调整的教育激励作用,而大宗族庇护人群范围越广,将弱化地权不稳定所强化的教育激励。

表 15 农地调整、宗族庇护与农户家庭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农地调整	-0.586** (0.261)	-0.042 (0.076)	0.614* (0.325)	0.306** (0.143)	2.282*** (0.499)	0.767*** (0.292)
姓氏数量	0.011** (0.005)	0.000 (0.001)				
农地调整×姓氏数量	0.030*** (0.011)	0.010*** (0.004)				
第一大姓氏占比			0.000 (0.003)	0.001 (0.001)		
农地调整×第一大姓氏占比			-0.015** (0.007)	-0.004 (0.003)		
前三大姓氏占比					0.007** (0.003)	0.001 (0.001)
农地调整×前三大姓氏占比					-0.034*** (0.007)	-0.010** (0.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231*** (0.939)	8.233*** (2.738)	3.869*** (0.864)	8.387*** (2.798)	4.651*** (0.887)	8.951*** (3.007)
观测值	7 412	6 980	7 179	6 759	6 726	6 352
R <sup>2</sup>	0.382	0.080	0.386	0.081	0.394	0.083

### (三) 进一步分析 3: 基于经济地理分区的考察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之间的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土地本身对农民教育投资的权重自然会有所不同。逻辑上讲,处于经济并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更可能以农为生,土地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显然,地权结构及其稳定性会对其教育投资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可能具有区域异质性,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地理分区对地权稳定性与农民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考察。

表 16 的估计结果中,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农村,农地调整显著促进农户教育支出,但并未显著影响其教育支出占比,且显著性与估计系数也明显低于基准回归。这表明,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比较弱。观察中部地区可以发现,农地调整显著激励农民的教育重视程度。而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地权稳定性不足将更为强烈地激励农民的教育重视程度。这一估计结果也进一步论证了本文的重要观点,依附于土地为生的农民或者处于生存预期不稳定、经济生活条件欠缺环境中的农民家庭,他们具有更为浓厚的“教育是唯一出路”的思想观念。

表 16 农地调整、经济地理分区与农户家庭教育支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占比
农地调整	0.069* (0.038)	0.076 (0.110)	0.731* (0.381)	0.081* (0.044)	6.649*** (1.895)	3.252** (1.286)	3.862* (2.060)	0.700** (0.3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域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823*** (1.372)	18.516** (8.963)	-0.250 (2.847)	1.900*** (0.474)	12.232*** (2.745)	10.208 (5.053)	6.665*** (1.808)	4.032*** (1.187)
观测值	2 970	2 731	1 855	1 742	2 259	2 192	460	441
R <sup>2</sup>	0.332	0.056	0.396	0.141	0.436	0.080	0.402	0.158

## 八、结论与讨论

农地历来被农民视为“命根子”。严酷的人地矛盾所导致的土地及与之配套资源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地权的不稳定将动摇生产和生存预期,决定了农民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脱离不稳定的生存环境。由此,教育成为重要的生存工具性手段,并往往成为农民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通过读书实现生存阶层的向上流动从而摆脱不稳定的生存环境,或者强化读书的信号显示以改变地权争夺中的力量对比,由此,农民教育投资蕴含着深刻的产权意蕴。

本文的主要结论:相比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发生过农地调整村庄内的农户家庭具有更高的人均教育支出水平和人均教育支出占比,并且农地调整村庄农民具有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且更不认同“读书无用论”。使用土地集中度历史数据刻画地权稳定性的稳健性检验表明,地权不稳定将会形塑“读书改变命运”的集体意识。机制分析发现,长期面临地权不稳定的农民具有更强烈的离农倾向且更加肯定教育的功用性价值,从而强化教育这一“正向隧道”的工具性作用。进一步证据表明,农地确权所强化的地权稳定性将弱化农地调整的教育激励效应;宗族对地权的保护将弱化地权不稳定地区的教育激励,而多姓氏村落中教育观念更为强烈;基于经济地理分区的考察发现,地权稳定性不充分所强化的教育偏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浓厚。

本文的理论含义:新增长理论将“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及增长,特别强调教育是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而家庭教育支出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跨期风险决策(王伟同等,2021),但普遍忽视了农民教育投资背后所隐含着的深刻的产权逻辑。事实上,读书、受教育在中国乡村、农民群体中具有生存保障价值和改变社会阶

层的工具性作用,并成为农民生存性的策略选择。农民通过读书、受教育,不仅可以“逃离”农村,同时可以强化家庭地权竞争力量。中国农村历来盛行“学而优则仕”“读书改变命运”“读书是唯一出路”的观念,本文从中国农地制度界定与实施的角度阐述了这一传统观念生成的制度诱因与产权经济学逻辑,从而有助于丰富有关人力资本性质的研究文献。

本文的政策含义:第一,地权稳定性不足会带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以及地权的内圈博弈,这并不利于农村的发展与稳定。因此,要从根本上重视农村的地权稳定性问题,进一步优化地权稳定政策的实施环境,保障农民地权排他性、稳定性与安全性。一方面,不断强化农民开展农事活动与农业经营的信心,使土地真正成为兜底农民生存底线、维系农民生产安全、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核心资源;另一方面,减小地权“公共领域”,压缩地权竞争、博弈的空间,强化地权法制化治理。第二,地权不稳定形塑的教育观无疑是工具性的,我国政府应重点关注并支持农村的教育事业,特别要重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问题,尤其要维护教育公平,改变教育观念,诱导农村工具性教育向优质性教育的转变。第三,教育的“正向隧道”效应也反映出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走出农村、离开农业的途径受限,农民面临着发展权利和竞争机会的约束。因此,政府应进一步赋予农民更为充分和自由的选择空间、竞争权利与发展机会,在中国农村大地上,树立起由“读书是唯一出路”“读书改变命运”转变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读书求知明理”的正确教育价值观。

#### 参考文献:

- 1.阿维纳什·迪克西特,2007:《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可供选择的经济治理方式》,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安超、康永久,2021:《大器晚成:“教育改变命运”的家族代际变迁及其双重面向》,《当代教育科学》第2期。
- 3.蔡昉、林毅夫、张晓山、朱玲、吕政,2018:《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动态》第8期。
- 4.陈柏峰,2020:《“祖业”观念与民间地权秩序的构造——基于鄂南农村调研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 5.丰雷、蒋妍、叶剑平、朱可亮,2013:《中国农村土地调整制度变迁中的农户态度——基于1999~2010年17省份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7期。
- 6.耿鹏鹏、罗必良,2021a:《“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经济评论》第6期。
- 7.耿鹏鹏、罗必良,2021b:《“约束”与“补偿”的平衡:农地调整如何影响确权的效率决定》,《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8.李尚蒲、罗必良,2015:《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 9.刘守英,2019:《集体地权制度变迁与农业绩效——中国改革40年农地制度研究综述性评论》,《农业技术经济》第1期。
- 10.刘云杉,2015:《“知识改变命运”还是“教育使人不被命运所摆布”》,《探索与争鸣》第6期。
- 11.龙登高,1998:《略论宋代社会各阶层的演变趋势》,《中州学刊》第3期。
- 12.罗必良,2019:《农地产权:调整、稳定与盘活》,中国农业出版社。
- 13.罗必良、耿鹏鹏,2022:《农民生存策略的选择逻辑——基于稻麦村庄农户样本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 14.仇童伟、罗必良,2017:《农地调整会抑制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吗?》,《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 15.王伟同、周洪成、张妍彦,2021:《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经济研究》第9期。
- 16.萧公权,2014:《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7.姚洋,2000:《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18.姚洋,2004:《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于建嵘,2001:《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 20.赵耀辉,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 21.周其仁,2002:《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2.周其仁,2017:《产权与中国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 23.Brandt, L., S. Rozelle, and M. Turner. 2004.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Property Right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60 (4): 627–649.
- 24.Chang, C. L. 1955.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5.Deininger, K., and S. Jin. 2009. “Securing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Lessons from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Land Contracting Law.”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0 (1–2): 22–38.
- 26.Giles, J., and R. Mu. 2018. “Village Political Economy, Land Tenure Insecurity, and the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00(2): 521–544.
- 27.Kulp, D. H.1925.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8.Ostrom, E.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9.Schwartz, A.1973. “Interpreting the Effect of Distance o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5): 1153–1169.
- 30.Udry, C.1996. “Gend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Househo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5): 1010–1046.

## Flee or Compete: The Impact of Land Rights Stability on Farmers’ Education Investment

Geng Pengpeng<sup>1</sup> and Luo Biliang<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 National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nd distribution mode and its stable state directly determine farmers’ livelihood and future life expectations. However, the fuzziness and instability of rural land right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inhibited the formation of farmers’ production stability expectation, but also gave birth to farmers’ land rights game strategy. This study finds that in areas with long-term land rights instability, farmers are more likely to agree that “reading can change the fate”, or to “escape” from the uns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by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or to strengthen the family land rights competition through education signal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s labor dynamics show that farmers in villages with less stable land rights have higher education investment level, longer education years, and less agree with the “useless study” theory. As a historical legacy, the unstable land rights will shape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reading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educational investment of Chinese rural families implies a profound economic logic of property rights.

**Keywords:** Land Rights Stability, Signal Display, Land Rights Game, Education Investment

**JEL Classification:** Q15, Q18, J24

(责任编辑:惠利、陈永清)